

## [江林昌]诗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变化

——兼论中国古代巫术与宗教有关问题

作者：[江林昌](#)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10-09 | 点击数：1063

**中国轴心文明的精神超越，在很重要的方面是体现在沟通神灵的适用范围与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突破上。具体地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观念的变化体现在由上层贵族普及到下层士民、由集体意识转化为个人意识。**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就诗的起源已提出了种种说法，例如，“心灵表现说”、“模仿自然说”、“巫术交感说”、“劳动需要说”等等。过去，我国学界往往采用“劳动需要说”。其实，这不能全面解释诗产生的直接动因。中国古诗起源之后，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早期发展阶段，并与宗教、政治的结合而显示了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又出现了新变化。

### 原始巫术与诗的起源：巫诗

五帝时代早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时段，诗源于巫术咒语。中国的巫术至少可以上溯到两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而到了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间的仰韶时期，已是相当盛行了。据西安半坡等地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鱼纹图”和秦安大地湾地画中的“蛙形骨骼图”推测，中国远古巫师们在乐舞状态下施巫作法时，当是口中念有巫术咒语的。只可惜由于时代久远，我们只能见到当时的巫师作法图，而不能听其巫术咒语诗了。所幸的是，周秦文献中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反映五帝时代早期的巫术咒语。如《礼记·郊特牲》记载了伊耆氏在蜡祭施巫时唱道：“土，反(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原始人在巫术观念支配下，试图通过吟唱巫术咒语，以控制自然的表现。这些相当于五帝时代早期的原始巫术咒语的反复吟唱，就成了诗歌采用重章叠唱形式的最初源头，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诗也就由此产生。

### 巫政合一与诗的早期发展：史诗

从考古学角度看，大约相当于五帝时代早期，中国文明已进入起源阶段。到五帝时代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了剩余产品，导致原来人人平等的氏族集团内部开始出现阶层分化。氏族集团中的如酋长之类的管理人员为占有剩余产品，开始改革巫术。《国语·楚语下》载有颛顼“绝地天通”，改革巫术的事例，氏族贵族阶层开始将原来平等的自然神分成不同的等级，其中日、月、星、辰等天体自然神被奉为最高等的神灵，且只有氏族贵族阶层才有权力沟通天神，至于普通氏族成员则只限于沟通

身边的草、木、水、土等自然神。这样巫术开始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巫政合一”的新现象，标志着宗教与史诗时代的开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颛顼改革巫术后，占有祭祀通天特权的氏族贵族阶层，与被他们统治的氏族平民阶层，属于同一血缘，即中国古代文明是在血缘内部形成的。自五帝时代中期到夏、商、西周近两千年的历史跨度中，各代氏族贵族阶层都是在血缘管理的框架内，以沟通天神为手段而治理氏族平民的。因此中国的宗教与史诗也在这历史长河中盛行不衰。可以说，中国文明起源到早期文明阶段，是一个宗教与史诗时代。

概括起来看，中国宗教的发展可以商代为界：五帝到夏代，由弱变强，商代达到高峰，西周出现新的变化。这是与中国古代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文理性精神的逐步自觉相一致的。中国史诗的发展也经历了逐渐丰富且有变化的过程。各氏族的史诗起初由氏族贵族阶层如祭司之类口耳相传，并逐代丰富。文字发明之后，氏族贵族阶层便将一些重要的史诗刻于甲骨、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以示重视，以便承传。夏、商、西周三代的史诗，一般都以“雅”、“颂”的形式流传下来。中国汉族史诗的内容大致包括叙述宇宙生成以沟通天神，追溯氏族图腾诞生以沟通祖先神，构建先公先王世系以明血缘历史，歌颂氏族祖先率族迁徙发展以增强民族奋斗精神。可以说，中国古代汉族史诗是“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的综合，值得特别总结。

从五帝时代中期到三代，氏族贵族与氏族平民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仍属于具有共同利益的血缘团体。史诗最显著的社会功能就在于通过追忆歌颂宇宙天神的开天辟地、民族始祖神的创造氏族、列祖列宗的发展壮大，从而凝聚血缘族团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为现实的社会分层，尤其是为氏族贵族集团占有社会财富找到最合理的宗教依据。

在宗教史诗时代，初民们坚信所有的自然神、祖先神灵都公正不偏，能够扬善惩恶。于是酋长祭司等上层贵族阶层在祭祀所有神灵时，都必须持有公正无偏之心。只有这样，才能与神灵沟通，获得庇佑大吉。在祭祀神灵过程中产生的诗与志，自然便具有了公正法度的含义。史诗的这一重要特征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精神原则。这一精神原则经春秋战国学者的进一步阐发弘扬而对以后两千多年的史学、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并逐步塑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优良品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 史诗文体的终结与史诗精神的转承

史诗在五帝三代时期是民族的圣典，是王官之学的主体。然而，这种独尊地位到了西周末年开始动摇，再经春秋战国时代而发生了变化。春秋时代史诗出现变化的基本特征是，韵文的“史诗”不再担任“史”的职能，“史”的职能交由散文体“春秋”之类来承担。《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正确含义应该是指，史诗作为神灵喻示与公正评判的记录，作为团结族民、治理社会的政治工具，始终是与“王者之迹”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王”是泛指血缘氏族社会贵族阶层的最高统治者。然而，“王官之学”到了春秋时代，终因周王朝的血缘管理纽带的

逐渐被解构而出现了变化，即由韵文的“史诗”来记载历史、承传历史的时代结束了，而改由散文的“春秋”来记载历史、承传历史了。也就是说，王官之学下移的同时，私学、私人著作开始从下层兴起。如孔子编述《春秋》，是由于当时血缘制度瓦解的社会背景下而为之，并在《春秋》中继承体现了王官之学史诗评判曲直、扬善惩恶、“以绳当世”的优良传统。

### 大小传统的融合与史诗、巫诗在《诗经》、《楚辞》中的遗存

五帝以前盛行的巫诗，至五帝中期经颛顼改革之后，开始分两支发展，并一直延续到夏、商、西周。一支在上层。这就是通天神与祖神的那部分巫诗融入到宗教中并与神权政权相结合，而发展成为新的形式——史诗。史诗在氏族上层贵族阶层中流传，成为时代的文化主流。另一支则在下层。这就是仍有大量以沟通身边山水草木等自然小神为内容的原始巫诗，继续在氏族下层平民中流传。

这上下同步发展的两支文化，恰好可以用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解释。宗教史诗为王官之学，乃贵族祭祀阶层所承担，自然属于大传统，为精英文化。而巫术、巫诗自然属于小传统，为民间大众文化。这大小文化传统之间，虽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但在我国五帝三代宗教史诗时代，其上下界限、雅俗之分，终究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界限分明的大小传统，在上下同步发展了两千余年之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终因王官之学的下移和士阶层的兴起而相互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恰好在春秋末期的文化伟人孔子所整理的《诗经》和战国后期的文化伟人屈原整理并加工创作的《楚辞》里得到全面体现。

例如，“颂”、“雅”、“风”最初是音乐的分类。雅、颂诗是宗庙祭祀所传唱，属于文化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邦风相对于雅、颂而言，是地方文化，是小传统。这两个传统，本来是上下流传、界限分明的。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却将它们综合在一起，编入《诗》中，正反映了西周末期以来，因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小文化传统融合的趋势。

不仅如此，十五“国风”，虽然相对于“雅”、“颂”而言是小传统，但实际上在诸侯国内部，也因有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之区别而在文化上有大小传统之分。

又如，《天问》的主体内容叙述了虞、夏、商、周及吴、秦历史，而不仅限于楚民族本身。这完全有别于五帝三代宗教王官时代，各民族史诗只叙其本民族历史，且严格限定在本族内世代相传的特点。《天问》这一综合性特点，表明其已不具备王官时代在宗教祭祀典礼上集体吟唱的宗教礼仪性条件，而只是五帝三代部分族国的王官史诗的综合保存。此外，王官史诗之代神喻示、公正评判、扬善惩恶的精神传统，在《天问》亦有继承与表现，如从正反两面立论，列举尧、舜、禹、汤、文、武等明君，因敬神修德、重贤才、爱百姓，而国运昌盛等。

### 史诗通神观念的突破与中国轴心文明的诞生

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是王权旁落，贵族世袭制的瓦解；另一方面则是士阶层的崛起，人类理性精神的全面觉醒。在这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新突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文明”。轴心文明的最大特点是人类精神思想上的“突破”，其核心便是对原初文化的超越。

中国轴心文明的精神超越，在很重要的方面是体现在沟通神灵的适用范围与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突破上。具体地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观念的变化体现在由上层贵族普及到下层士民、由集体意识转化为个人意识。如儒家孔孟思想、道家庄子思想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必须强调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在沟通神灵方面的突破虽然已表现为由外在的集体性礼乐史诗，转化为内在的个人化心灵，但王官时代史诗的公平正直之精神仍然是个人内心通神的重要原则。所以庄子强调“内直”，余英时先生译为“内心诚直”；孟子要“尽其心”，杨伯峻《孟子译注》解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这是中国轴心文明所表现为“突破”的最闪亮之处，也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崇高所在，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优秀品格的根本基础。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